

英国文学史

出版说明

本书系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英国文学史》第二卷第一分册，1953年由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目 次

绪 论	A. Φ. 伊瓦先科(1)
第一章 1789年法国革命与英国文学	Б. А. 库兹明(36)
第二章 湖畔派	P. M. 萨马林(77)
第三章 托马斯·穆尔、威廉·赫兹利特、 瓦·萨·兰道和利·亨特	P. M. 萨马林(125)
第四章 济慈	P. M. 萨马林(158)
第五章 司各特	A. A. 叶利斯特拉托娃(187)
第六章 拜伦	A. A. 叶利斯特拉托娃(241)
第七章 雪莱	E. Б. 杰梅什卡恩(376)
结束语	Ю. А. 加济耶夫(476)

绪 论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广大的文学思潮来说,乃是一定的历史转折时期——即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特征。在这时期,经过巨大的社会斗争和残酷的经济改造,资本主义的“金钱”王国,就替自己铺设了走向统治的道路。一个新社会出现在历史前台,它跟封建社会比较起来是更高级的,但是孕育着根深蒂固的矛盾。随着这个新社会制度所固有的矛盾的展开——这些矛盾后来(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便发展成为劳资之间势不两立的冲突——,随着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成长,浪漫主义,这种广泛而多采的意识形态现象,也就失掉它的根据了。①

浪漫主义的思潮,在英国文学上,具有非常尖锐而复杂的方式。这一情况可以用英国资产阶级发展道路的特点来说明。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本序言中,恩格斯把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断定为“兴起的资产阶级和以前的封建大地主间”的妥协的“出发点”②。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的发展和革命,就是从君主立宪巩固之后开始的”③。

① 浪漫主义的倾向后来也并没有绝迹于英国文学,但是,作为一种广大的文学思潮来说,浪漫主义已成强弩之末了。

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八,第279页,俄文版。

这些革命特征，在英国的“启蒙运动”的性质上也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它具有妥协性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特色。无疑的，法国的启蒙学派，比起英国的来，是更不妥协，对封建秩序的批判更彻底，而且竭力去提出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正当法国启蒙学派还仅仅在意识形态方面准备着资产阶级革命攻势之时，英国的启蒙学派已经不得不考虑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实际发展的事实了。同时，英国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带来了人民大众闻所未闻的痛苦，加重了英国启蒙运动文学杰出代表者作品中的批判倾向。

在个别的作品上，启蒙时代的英国作家竟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能够正确地暴露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从1722年至1748年二十五年间，创作了《摩尔·弗兰德斯》，《格列佛游记》，《江奈生·魏尔德传》），虽则应该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经济方式还是不发展的，这是十八世纪前半期的特征。恩格斯在论及英国简单手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时写道：“六十或八十年前（该文写于1844年——作者），英国还是这样一个国家，正如别的国家那样，它的城市不大，工业不甚重要，也不很发展，人口稀少，多半是农民”^①。

自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初叶起，资本主义工业的突飞猛进，把英国社会面貌彻底地改变了。

恩格斯在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说道：产业革命之于英国，正如政治革命之于法国，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到了法国革命爆发的时候，英国已经独占鳌头，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经历过产业革命风暴的国家了。在这些条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第314页，俄文版。

下，英吉利海峡那边的事件^①，就不免在英国唤起了极其剧烈的反响。在这个意义上，不妨把英国的浪漫主义称为两个革命的“产物”，即十八世纪末叶英法两国社会生活的交错因素影响下所引起的一种现象。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在英国便显出了产业革命的无情的后果。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李嘉图已经“以毫不容情的率直，作出了从观察和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得来的一切结论；他甚至公开地说明有一种为生产的生产存在着，以及劳动力已转化成同其他一般商品一样看待的商品——而且说，对于‘社会’重要的只是纯收益，那就是说，只是利润的多少”^②。

十八世纪末叶，英国达到了最尖锐的矛盾的焦点——土地的（苏格兰）、土地兼民族的（压迫爱尔兰人）、殖民地的（美洲的战争、奴役印度）、内政的（腐败的议会制度）、宗教的（压迫天主教徒）等等矛盾。法国革命事件促使这些矛盾日益鲜明地暴露出来。暴风雨似的社会冲突，引起了并且确立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文学上进步思潮与反动思潮之间的鲜明界限以及这两者的斗争。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英国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对抗性质，足以说明正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所以异于那个时期德、法、意浪漫主义的那些特点。

那些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问题，经生活提出并且侵入文学里面，便打破了陈旧的美学观念，突破了在十八世纪文学上形成的陈旧、较为狭隘、而且往往局限于家庭生活领域的叙述的规模。因此，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英国文学的题材和主题的范围大为扩大了。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或《唐璜》，雪莱的

① 指法国革命。——译注

② 《列宁全集》，卷二，第184页，俄文版。

《麦布女王》及其他诗作，穆尔的作品，都足以为这点的明证。这些作品证明了：法国革命所引起的冲突，其客观的世界历史意义是如此之深，其牵涉和影响是如此之广，所以要求叙述上引伸到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广阔天地，并引向壮丽而富有特色的“全景式的”情节开展。

这些冲突也侵入十八、十九世纪交替期间的英国文学里面，而且往往带上激烈的、悲剧而不可调和的性质，例如，拜伦的《东方叙事诗》便是如此。因为竭力去捉摸现实矛盾中的严肃而意味深长的意义，并且企图以某种“包罗万象”的艺术形式把它表达出来，革命的浪漫主义者（这点尤其是他们的特征）处理形象和场面时往往倾向于“泰坦主义”（如，拜伦的《曼弗雷德》和《该隐》，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他们企图通过巨人们单枪匹马作战的壮丽景象，以传达那个充满暴风疾雨的时代的感触。

英国浪漫主义的社会本质，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要想象出它的复杂性，就应该估计到，英国统治阶级以何等强烈和不人道的残酷方式，去实行他们创造资本主义秩序的历史使命。“善良、古老、快乐的英格兰”居民的整个整个阶级，简直是因产业进步的暴风雨的摧残而被灭绝了。而旧时代所残留下来的唯一阶级，——恩格斯曾指出——就是“显贵的地主，即国内唯一残留下来而没有吃亏的贵族阶级，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分成小段出租，并住在伦敦或者外出旅行吃着租息……”^①。住在自己的领地而把土地出租的外省土地所有者（所谓“乡绅”squires）这个阶级，已经完全绝迹了；他们从前在宗法制的英国农村地区是称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第355页，俄文版。

称霸的，可是他们的后人习染了首都显贵的生活方式，而且“除了地产而外，跟他们的粗鄙不文的祖宗毫无相同之处”^①。土地所有者的第三个阶级——所谓yeomen（自耕农），自耕其地的小地段所有者——也绝迹了。“自耕农而外是佃农，他们除了经营农业还常常经营纺织业”^②，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英国来说也不过是过去的陈迹而已。恩格斯断定：差不多全部土地已分割成为数不多的出租的大地产了。

恩格斯写道：“竞争把小佃农和自耕农逐出了市场，使他们破产；他们变成了农村的雇农和靠工资过活的织工，他们补充着群众的队伍，城市因他们的流入而以惊人的速率成长”^③。

所以，问题在于英国社会基础的急剧而深刻的变革。在这个古老的、半封建的国家的改造过程中，独立的小农场主阶级之被消灭——这件事，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曾不止一次指出这情况。譬如，他说：“克伦威尔之后过了一百年，英国的自耕农阶级(yeomanry)差不多完全绝迹了”^④。那些曾亲手完成十七世纪革命的人们、曾是革命“战斗军”的人们也绝迹了。农民阶级做了因巩固新社会制度而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的第一个牺牲者。

在消灭自由农阶级——往日社会历史运动之支柱——当中，英国革命的无远见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性质，便充分地暴露出来。这件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事实，在许多方面决定了十八世纪后半期和十九世纪初叶英国文学的命运。譬如，麦克斐孙(James Macpherson, 1736—1796)的作品，托马斯·珀西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第356页，俄文版。

④ 同上，卷十六，第二部，第297页，俄文版。

(Thomas Percy, 1729—1811)的古代民歌集(1765)^①等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克伦威尔之后过了一百年……”),古代崇拜和民歌崇拜的风气的发生,是合乎规律的。文学企图以对过去遗迹的注意来补偿与英国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性诗歌的“消失”。当然,慕古之风在不同的作家中有不同的思想内容。在拉德克利弗夫(Mrs Anne Radcliffe, 1764—1823)与华尔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的小说中,对中世纪和“哥特派”的崇拜,仅仅是使得社会生活的现实内容模糊而已。反之,瓦尔特·司各特却借助于“古代”,以便更清楚地阐明英国民族和历史发展的道路。

英国历史上的新时期开始了,那时“城市的平民分子”(恩格斯语)便越来越坚决地参加社会斗争,那时自耕农以颠沛无告的无产者这新社会阶级的姿态出现。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运动开始之日就是过去农民英国覆灭之时,这不是偶然的。马克思说道:“我知道这英勇的斗争,英国工人们自前一世纪中叶便已进行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寂寂无闻,仅仅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把它掩饰,讳而不言罢了”^②。

论到无产阶级英国的诞生,恩格斯指出六十年代转折时期的一件有趣的事实:“与产业革命同时,民主的政党产生了。1769年,约翰·霍恩·图克(John Horne Tooke)创立‘权利法案协会’(Society of the Bill of Rights),这协会的人员自共和国成立之日便最先从新讨论民主主义的原则”^③。民主主义

① 指珀西所编的《英国古诗拾遗》(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

——译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十一,第一部,第6页,俄文版。

③ 同上,卷二,第365页,俄文版。

者,有哲学修养的人们,遭遇着上等和中等阶级的敌视,唯有工人阶级听信他们的原则。“他们很快便在这个阶级中间组成一个政党,而这个政党早在1794年已经是相当强大的了,虽则还未强大到有组织地行动起来”^①。

在十九世纪初逐渐成熟的无产阶级反资本主义势力的存在,对于那个时期的英国文学史是起着相当重要作用的;没有这一事实,革命的浪漫主义思潮(拜伦、雪莱)的出现和兴盛便无从解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封建贵族反动恶势力、反对“保守党寡头政治”的斗争,古老的农民英国及其基本社会势力的覆灭,以及与此有关的无产阶级新英国的痛苦诞生——这整个伟大的社会性的时代悲剧,就成为那产生思想上丰富多采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

马克思在论及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特征时写道:“……劳动与资本之间的阶级斗争退到幕后,它在政治方面被团结在神圣同盟周围的封建主与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双方的纷争所遮蔽了”^②。

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引起了许多欧洲作家的注意,而作为一个主要因素表现在英国浪漫派的创作中。英国浪漫派革命阵营的作品,在处理民族解放运动这一主题时所表现的莫大力量和深长意味,乃是英国国内(爱尔兰)的解放斗争与欧洲诸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的相互影响所引起的。欧洲封建贵族反动势力的加强,在英国就转化为反对本国人民的运动(“禁止言论法”、废除人身保障[habeas corpus]等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第365页,俄文版。

^②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10页。

使当日欧洲四分五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象聚在焦点上似的集中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现实上。马克思早在1870年写道：“……在爱尔兰，土地问题一向以来是社会问题的特殊形式，因为它是一个生存问题，对于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来说，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同时也是同民族问题分不开的……”^①。

英国的革命浪漫主义，是在风雨飘摇的社会动荡的环境中成长的，所以能够达到表现时代的最尖锐矛盾的高度，这些矛盾在意义上是超出英国本国范围之外的。

依照惯例，把英国的浪漫主义史看作几代浪漫主义者彼此更替的历史，看作其“主题和情调”从一代浪漫主义者向另一代过渡的和平而连续的发展过程——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英国浪漫主义史的分期方法，不应依据形式上的编年原则，而应依据社会阶级斗争的原则。

资产阶级的文艺学，只能做到断定各国文学上浪漫主义思潮的一般表面特征，而把它们总括于“浪漫派”这一概念之中而已。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事物，便一笔抹煞了具体的、历史的浪漫主义本质的问题。

要确定浪漫主义的本质，要确定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社会意义，就必须从唤起那种思潮的历史过程的内容出发。浪漫主义乃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胜利与巩固时期发生的文学思潮；浪漫主义乃是在劳资间矛盾尚未展开的条件下反抗资本主义进展的反对势力，它代表着维护资产阶级圈外的人类生存原则的一种企图。以英国浪漫主义为例，可以看到，有些与因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十六，第49页，俄文版。

而破产的阶级有关的浪漫主义者，在反抗资本主义进展时，往往向资本主义以前的秩序寻求出路（“湖畔派”诗人）。另一些反映着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阶级的希望的浪漫主义者，在批判资产阶级进展的畸形现象时，则向往于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的一种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未来社会的理想（雪莱）。因此，不妨把浪漫主义说成是反抗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奴役人的个性的一种起义，说成是对资本主义以外的生活方式的一种理想，虽则这种理想在进步与反动浪漫主义者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思想的和历史的意义。浪漫主义中的进步派与反动派，乃是两个在思想上彼此对立、彼此敌视的阵营，这两个阵营无论在政治思想方面或美学方面都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

当反动的浪漫主义者向后回首，梦想着倒退到古老的中世纪宗法制度的生活方式时，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则向前瞻望，而且，例如雪莱，同空想社会主义者互相呼应，努力去体会一种没有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惨痛矛盾的未来社会制度的理想。当反动的浪漫主义者竭力反对启蒙时代美学上的唯物主义倾向和现实主义倾向，而竟然崇拜一种玄之又玄的“孤芳自赏”的语言（柯勒律治），或者企图去确立想象力的威权，仿佛想象力单独能够从现实生活的沉重枷锁中“解放”人类（华兹华斯）等等，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则在探讨美学时，总是以启蒙时代美学的进步倾向为依据，追求着具有哲理才思和社会意义的艺术（雪莱）或者具有政治战斗精神的艺术（拜伦）。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创作，是朝着现实主义的具体概括这方面发展的，而以明晰、朴素、通俗易解作为自己的理想（他们的晚期作品便是明证）。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英国作家，是不能忽略了当代主要的有决定性的问题的——这问题就是在资产阶级关系的胜

利面前社会与个人的命运问题。对待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进展的态度,便成为决定英国文学上的力量对比的主要因素。

英国社会矛盾的水深火热的情况,自然促使英国社会各阶层对1789年法国革命发生热烈的反响。浪漫主义文学就在这暴风骤雨的气氛中诞生。

英国浪漫主义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恰好就是法国革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产业革命的残酷的社会后果,与法国革命的政治后果互相交错,便唤起了所谓“湖畔派”那群作家(骚塞、柯勒律治、华滋华斯)的创作,他们反映着因资本主义而破产的阶级的希望。这群作家的早期作品,都带有对法国革命的同情的色彩。在“湖畔派”诗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逼真得惊人的人民生活情景的反映。

“湖畔派”诗人同情革命是真诚的,虽则其同情是十分抽象而且有局限性,仅仅是限于法国革命初期而已,那时候法国还好象是准备按照1689年英国的妥协方式来完成革命。

在革命的年头,急剧的政治运动活跃起来了。恩格斯指出:“可是,在资产阶级中间毕竟有少数进步人士——这种人从妥协中无甚利益可图。这少数人的成份主要是不甚富裕的资产阶级,他们对革命抱同情态度,可是在议会里是没有势力的”^①。无疑的,这少数人,其利益因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妥协性质而受到损害,其中最进步的份子便想把法国革命的经验移植到英国来。这些在议会里没有势力的少数份子,就只好乞援于议会之外的势力了。

工人们既加入了1792年创立的人数较多的“通讯协会”,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十六,第二部,第301页,俄文版。

卷入政治生活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视这个民主政党，“它早在1794年已经是相当强大的了”^①。恩格斯在另一个地方也强调八十至九十年代间民主党(工人的政党)对于英国无产者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重大意义：“宪章主义(Chartism)是民主党的产儿，这个党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与无产阶级同时发生而且是在它内部发展起来的”^②。

在社会斗争的进程中，讨论产业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教训的丰富的政论文学成长了，当时民主运动的伟大代表者，托马斯·潘恩与威廉·葛德汶，也崭露头角。潘恩于1791—1792年发表《人权论》，葛德汶于1793年发表论文《政治正义论》。

这些作品的作者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发展的公民社会和国家机构乃是人类腐败之极的结果。葛德汶认为：自由就是绝无任何外在的强制，人可以无须法律和国家机构的监督而合理使用自由(无损于社会利益)。他抗议任何阶级的统治，相信福利分配的唯一公平原则就是各取所需，所以马克思指出葛德汶观点的进步性质：“……葛[德汶]以此接近共[产主义]……”^③。

然而，同时葛德汶却认为：排斥社会劳动而各自为政的小生产者的无政府式的自由结合，乃是政治正义的理想。所以马克思着重指出：“……要之，他在结论上是断然反社会的”^④。

葛德汶同情法国革命，却又主张不以暴力抗恶；他了解贫富的利益是不可调和，而又相信可能用教育和说服的方法和平地过渡到绝无阶级压迫的理想社会。对资产阶级以外的社会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第365页，俄文版。

② 同上，卷三，第509页，俄文版。

③④ 同上，卷二十一，第18页，俄文版。

道路锲而不舍的寻求,对资产阶级统治之不合理愤然的抗议,使得葛德汶成为最后一个启蒙运动者和最先一个浪漫主义者。在抗议古老封建大地主社会的不合理(“血统特权”)时,他在许多地方还是一个未能摆脱幻想的典型的英国启蒙运动者(参阅他的小说《卡莱布·威廉斯》的妥协结局);在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的合理(“黄金特权”)时,他就跟浪漫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如出一辙(《圣利昂》)①。

葛德汶与潘恩的思想,在“湖畔派”诗人的早期作品中也引起共鸣,他们歌颂废除专制的自由,称之为人类的自然状态(譬如,骚塞的《瓦特·泰勒》和《圣女贞德》,华兹华斯的抗暴的诗作)。骚塞和柯勒律治醉心于在美洲建立一个理想公社的思想——这个“大同之邦”(Pantisocracy),是要以实践来实现葛

① 能够反映英国人民大众利益的最民主的领导者是威廉·科伯特(William Cobbett, 1763—1835),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政论家,“旧的英国急进主义”的“创始者”,“就他的天性和同情来说是平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九,第178页,俄文版)。

科伯特的活动的鼎盛时代是在1810至1820年间,其时潘恩已经去世,而葛德汶也退出了舞台。马克思指出,随着自十八世纪起旧英国社会的瓦解而来的深远的变化,“感发了他〔科伯特〕的想象,使他的心灵充满了热情”(同上,第179页)。

不错,科伯特看不出使英国人民大众陷于十九世纪初他们所处的贫困情况的原因和社会力量。然而,马克思写道,“威廉·科伯特,本是人民大众反抗资产阶级侵害之天生的捍卫者,所以被人视为而且自视为争取产业资产阶级利益反对世代相承的贵族阶级的战士——这件惊人的事实就是由此发生的”(同上)。

这里不得不指出科伯特在语言范围内的重大贡献,拉·福克斯在其《小说与人民》一书中已经很热烈地论及这点了。科伯特的作品是用有力、清楚、明确、真正人民的语言写成的,确实是那个时代的杰出的现象。

德汶的《政治正义论》的原则的。早期浪漫主义者的这些无政府共产主义计划,当然是空想的计划。然而,这种浪漫主义乌托邦理想之所以能够发生,正好反映出惨痛的社会贫困,那是英国劳动人民为产业进步与社会进步的胜利所付的代价。所以,那些反映英国人民大众所受非人苦难的画面,也见于“湖畔派”的作品中。

对法国革命的“极端”平民方式深感不满,因英国国内人民有可能起义而不胜惶恐,这就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早在1790年,反动保守党寡头政治理论家之一,伯克,在其《法国革命的感想》一文中就大声疾呼对“动摇了根基的”革命影响作斗争。正当普莱斯博士(“少数进步份子”的活动家之一)号召依照法国的榜样以完成英国的革命时,反动派的口号却是“寸步勿进!”以肉体的迫害(逮捕、放逐、解散社团)和思想的战斗(1797年的杂志《反雅各宾党人》)等方法,反动政府竭力摧残民主运动。

反动势力日益增强的时期,在“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的作品中有着多方面的反映。他们响应并且发挥葛德汶学说的反社会的方面。伯克认为国家是一种不堪任何革命改变的自然有机体的学说,以及他视艺术为一种能使人对“超自然”现象之世界凛然生畏的力量的看法,也博得他们的响应。华兹华斯抨击产业革命,他认为产业革命歪曲了万物的“自然”秩序。他把古老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农民英国理想化,就是反动浪漫主义的表现。

华兹华斯的诗中人物,乃是“归真返璞”、回到资产阶级之前的生存而弃绝理想、逃避社会生活的人物。华兹华斯是清教徒式的温柔和“农村生活的愚直”的热烈赞颂者,他与柯勒律治和庸碌诗人骚塞一呼一应;柯勒律治说个人意志和一切个性表现

尽是人类的绝大罪孽，而骚塞则重弹中世纪教会文学的老调，作政治性的劣诗来歌颂“神圣同盟”和英国皇室。

这三个诗人的共同点，首先是不信仰人类的理性，把精神贫乏、恪守阶级和宗教成规的人们理想化，憎恶社会活动家的个性而视之为“貽害”社会的根源。柯勒律治之所以崇拜德国的唯心哲学和美学，也正因此故。1798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合编的《抒情歌谣集》的出版，可以视为反动浪漫流派的思想与美学形成的开端。

反动浪漫主义日益露骨地蜕化之日，正是自九十年代后半期起英国反动势力嚣张跋扈之时。英国开始同革命的法兰西作战。在十九世纪第一个十年间，民族问题取得了重大的意义，欧洲大陆方面的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使得这个问题尖锐化。在英国国内，统治阶级面对着民族解放运动的事实。英国海员的起义和爱尔兰的历次起义（1798—1803），被英国政府残酷地镇压了。

英国的资产阶级日益成为民族自由独立的摧残者，杀害着爱尔兰人，然而也同样地屠杀英格兰人民。但是，在大陆方面，英国资产阶级却企图扮演各民族反拿破仑专制的自由主义“保卫者”的角色。在前一场合，在英国国内，英国资产阶级的政策带有对全体人民露骨的血腥镇压的性质，那是统治与利润的贪欲所使然的。在后一场合，在“宅门之外”，它的政策便带上自由主义的假面具，伪称其“思想”动机是解救欧洲民族于篡夺者拿破仑的羁轭之下，虽则在这一切后面隐藏着十分冷静的物质利益打算。英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掩盖着它打算在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扩张领土的目的，以及争夺法国殖民地（安提耳群岛、塞内加尔等等）的用心。马克思曾指出：自由主义